

投石的訴說

—

擲出石塊的是一個少年。他站在熊熊的烈火中央，迎著隆隆駛來的怪獸。他的耳際轟響著的，是地獄裡淒厲的風吼，和烈火焚燒石頭的聲音。環繞的一切都尖銳、鈍悶、灼燙而恐怖。怪獸挂著金屬板的裝甲，傲慢又野蠻，沿著街巷橫衝直撞而來。石塊在迸濺中粉碎，一切傾聽都被擋在了背後。在這恐怖的野獸軋碾之下，一切都變成了瓦礫，一切都化成了廢墟，包括新世紀的精神，包括生存的希望。



油畫：投石訴說

少年從瓦礫裡抓起一塊石頭，套上投石索，奮力朝那鋼鐵的野獸擲去。又一聲砰的聲音迸響在金屬板上，紅色的火焰映照著他舞著投索的弱小身影，如一個新鮮的塑像，如一個迎戰魔鬼的大衛王。

大衛王的使命，如今正由這個巴勒斯坦的少年承擔著。大衛這個名字用阿拉伯語讀，恰好就是他的名字達烏德。戰爭怪獸裡跳出兇惡的軍隊，抓住了他。達烏德的手被一根窄細的白色硬塑料帶子反綁，士兵們毆打著他，活活地折斷了他的一條胳膊。

瓦礫堆裡同時跳出十個少年，他們憤怒地用投石索、用彈弓、用赤手把石塊投向毒焰和怪獸般的坦克。嗖嗖紛飛的石塊撞在坦克的裝甲板上，響起一片悲憤的聲音。

——這不是文學的描寫，這是完全的現實。硬塑料的窄帶是最新的綁人工具，它比手銬更使人疼痛，比繩子綁的結實。揭露以色列軍隊折斷投石少年手臂的行徑及其法西斯心理的，是葡萄牙的著名作家薩拉馬戈。「大侵入的前夜」一文介紹了他引起軒然大波的發言：

他的發言要旨是這樣的：「折斷參加 Indifada（起義）的投石少年的手臂，就其精神而言，在犯罪一點上，可以與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相比較。」^①

他冒險發言的原因，是因為他聽見了石塊傳達的語言。他聽懂了，並因良心的驅使不能迴避。

使用石塊難道能進行戰爭麼？不，這不是戰爭手段，而是心情的傳達。巴勒斯坦人用這樣的語言，呼喊著公正，呼喊著最古典和最低限的良心。投石的語言是神奇的；它超越了障壁喚起了良知和同情，也為非武裝的民眾反抗，作了痛苦而警醒的定義。

自從 1987 年的巴勒斯坦人民第一次起義（Indifada）以

①（日本）岩波書店，《世界》2002年6月號，第53頁。

來，這種達烏德~大衛式的象徵行為、以及這種石塊迎擊坦克的聲音就沒有停止。孩子的石塊不可能打敗坦克，所以這是象徵、這是一種語言表達而不是戰爭手段。孩子們的石塊說出了巴勒斯坦民眾抵抗的正當性。孩子們用石塊說：我們沒有武器。我們用石塊呼喊。人們，你們聽見了嗎？

二

我的耳朵聽見了他們的聲音。有很多耳朵聽見了這石頭的訴說。這聲音和這形式太富於象徵意味了，我甚至覺得巴勒斯坦的少年們是在寫作著一部詩篇。這詩篇因為使用了超越一切語言的語言，所以使一切詩人的作品都黯然失色。

象徵和語言遇到的，是瘋狂的野蠻主義。從2000年9月起，因沙龍對阿克薩清真寺的冒瀆再次掀起了第二次Indifada。石塊同樣竭力傳達著這種弱者的語言，但是希望被坦克的履帶一天天碾得粉碎。與肆虐的坦克唱合著，世界在骯髒地「看殺」。於是，在對被剝奪和被侵略者的殺戮中，出現了懷抱炸彈的犧牲反擊。絕望的石塊，在悲憤的盡頭變成了赴死。

有教養的知識分子說——這就不對了！這麼一來不就是以暴易暴了嗎？這種造成平民傷亡的行為，同樣必須譴責！

這種批評是面對屠殺表演公允。其實天平早已傾斜坍塌，其實人們早已使用極限上的語言呼救。知識分子公允病的症狀後面，藏著他們接受既成事實的妥協心理。說到底還是與強權為伍劃算，所以他們佯作沒聽見石塊的呼救。他們把一個絕望民族的利益，換了卑怯的自慰感覺；他們不肯說一句——佔領是最大的恐怖主義，國家恐怖主義是最大的犯罪！

哀兵如同坐以待斃，投石的語言，被人們充耳不聞。那

麼只剩下投降或者殉死，再無他途可供選擇。

石塊在絕望的盡頭，含著眼淚爆炸了。它一頭撞上那戰爭的野獸，發出孤獨的一響，然後被黑煙烈火吞沒。

以一己之死訴說的人蒙受著誹謗。他們動人的語言和難忘的形象，在火獄烈焰的映襯下，在鉅大的話語壓迫下，被描黑畫醜、被下流地歪曲。

另一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——媒體在卑鄙地誘導。滿足於自私的小康，人們習慣了白日的謊言。確實炸彈造成了傷亡。但是，以死為語言的人所實踐的，同樣不是戰爭行為而是語言的傳達。他們企圖用悲憤的一聲轟響喚醒世界：我們只剩下了生命。人們，你們聽見了嗎？

三

聽見了石頭的訴說的，是如薩拉馬戈一樣懷有正義感的人。即使生逢如此時代，他們也決心回答。

在納粹屠殺猶太人最烈的時期，曾有一個日本外交官抗拒正與德國結盟的政府命令，為逃命的猶太人發放了離開歐洲的簽證。他的遺孀最近發表給沙龍的公開信，要求以色列從巴勒斯坦撤軍。

應該讓更多的人聽見這位 90 歲老婦的聲音。她的公開信全文如下：

平成 14 年（2002 年）4 月 11 日

沙龍總理：

對以色列從巴勒斯坦撤退的要求

沙龍總理，切望無論如何，從巴勒斯坦做有勇氣的撤退。並實施基於人道主義的政策，向中東和平做出努力。

亡夫曾於1940年就任立陶宛代理領事。當時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屠殺，正激化得超絕想像。北歐小國立陶宛也曾有大量猶太人逃來，我至今難忘領事館門前擁擠著的、為獲取簽證的人們那必死的表情。亡夫曾向本國外務省提出了發給簽證的請求，卻因日本正與德國結於同盟條約、並有諸端理由而被駁回。

但膨脹增多的難民的悲痛聲音只見逐日高漲。亡夫於苦惱之極，在征得家庭全員贊同後，做出了「吾寧負日本政府，不能負神」、並發出簽證的決斷。他連日徹夜書寫簽證。我們不清楚發出的簽證數量，只記著他在有限的些少時間裡，不眠不休書寫簽證的情形。後來才聽說有6000人獲救。依出版社的強烈要求，《六千個生命簽證》一書也在後日出版了。1945年5月，與德國的敗戰同時，我們一家被軟禁於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郊外的俄國收容所，至1947年歸國一直流離於各地的集中營。歸國後外務省逼迫亡夫辭職，並不顧及他早在戰前便為國效力，而追究其發給猶太人簽證的責任。亡夫依外務省之意退職。那以後原本寡言的他更加沉默，他覺得因良心判斷而致使家庭連累，因此蒙著很大的心理負擔。後來仰仗多方好意他才再獲職業，總之生存下來。

他於1985年被以色列政府以援救猶太人生命的功績授予「Yado Basiem」獎（諸國之正義者之獎），次年7月3日靜靜降下了人生的激動之幕，享年86歲。

亡夫的行為，是我一家的鉅大榮耀。一生中能救出那樣眾多的生命，且被救助者後日又多肩負以、美政界乃至世界經濟之重任，聽聞這一切亦使我一家無比喜悅。

但是，今日之侵攻巴勒斯坦，無論其理由如何，都給我們帶來了莫大的悲哀。不僅如此，每當想到慘死戰禍者的遺族又蒙於難忍的悲痛，我們便無法不為——究竟亡夫那樣寫下簽證好嗎？抑或沒有寫更好？——諸如

這些而苦惱不已。

我今年已 90 歲了。四個兒子中，三子晴生和長子弘樹已經辭世。長年來，我和成為家長的次子千曉一起生活在鄉下。我已經不可能再活很久了。唯一惦念的事情，只是培養能繼承亡夫的「植根於人道主義的活動」的人。這是繼承亡夫意志的我們的最後願望。

去年末因不況，我們失去了長年住慣的家屋。或許人會覺得我們窮，但我們卻永遠抱著衫原千畝遺留的行為，懷著清高端正的自豪生存著。我們是幸福的，切勿對我們施與同情。

用不著為一個人，我們請人們關心的是「基於人道主義的活動」。請想想究竟還要讓多少貴重生命在戰爭和自然破壞中死去，並切請在此刻，再次審度以色列的侵略帶來的悲哀和損失的鉅大。無疑，我相信武力之外還有解決之道。

致親愛的沙龍總理
敬具

生命的簽證財團會長衫原幸子
日本衫原事務所代表衫原千曉
聯絡：0466-48-8344 (Fax)

URL: <http://www.hoops.livedoor/~sempol> ②

人道已經是個愈來愈曖昧的命題。但是，高尚的外交官衫原千畝和 90 高齡的衫原夫人為人們提出了最準確的標準。他們是崇高的人道大義的實踐者。在猶太人受到非人道的追殺時，他們勇敢地反抗自己的國家，向弱者猶太人伸手

② 《世界》2002年6月號，第72~73頁。

救援。而當以色列對今日的弱者——巴勒斯坦人欺凌殺戮的時候，他們凜然地「基於人道」，再次打破了世界的可恥沉默。

薩拉馬戈的發言，立即遭到了以色列的威脅。而面對著衫原千畝的遺孀和兒子的批判，面對著民族的救命恩人和他們的行為，那些指揮坦克去碾碎生命的人會怎樣呢？

在世上一切高尚行為的面前，在奧斯維辛的死者與生者的面前，他們不能躲避——被孤立的劊子手的恐懼。

四

第三世界的理論名著《東方主義》的作者愛德華·薩依德曾經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，彎下病弱的身體，拾起一塊石頭，朝以色列方向投了出去。他用這塊石頭，表達了對這象徵語言的理解。他表示自己也要加入被侵佔與被侮辱一方的行列，也要使用這種語言。

各自使用自己「石塊的語言」的並不是少數。

在侵略的步伐加劇以後，一批批救援者出現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，企圖衝破卑鄙政客設置的「進程」，直接向被侵害的人們伸出救援之手。他們沖進一個個被蹂躪的地點，沖進伯利恆聖誕教堂，給蠻橫的現場注入正義。

雜誌上刊登著一張照片，是在被毀滅了的傑寧。一個剛剛抵達的歐洲婦女踩著瓦礫，揹著背包，在一片慘景前，她終於失去了控制，不由銳聲地尖叫起來。她只顧尖叫，說不出話來。

那尖聲哭號的形象烙刻一樣留在我的心裡。她也沒有語言。她的哭叫，用的是和投石少年一樣的語言。

並不因為足夠的誹謗和醜化，就能改變人的良心感受。90 老人的語言，嚎叫女人的語言，可能是最溫和的、也是最

深刻的語言。它們直擊人心，敲響本質，它們和少年擲出的石塊一樣，都是絕望盡頭的呼籲。

這個被下流的媒體和文人炒作的「千禧」新世紀，它居然使那麼多人「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」，並且使用了這樣的語言！

2002年3月25日，巴勒斯坦詩人馬赫穆特·達爾維什在接待薩拉馬戈一行的致詞中說：

語言的名匠在血的雄辯面前不能修辭。所以，我們的語言和我們的權利一樣單純。我們在這塊土地上出生，我們屬於這塊土地。我們除了母親的語言，沒有其他的母語。而每當我們理解了這母親之地擁有太多的歷史和太多的先知的時候，我們也就理解了這裡是複數主義的共用空間而不是地獄；理解了誰也不能獨佔土地、神、和記憶。我們還知道了歷史既不美麗也不優雅，但我們的任務，就是作為人，使歷史更加人性化。因為我們自己就是這歷史的、同時也是犧牲者的產物。^③

我想他在用阿拉伯語娓娓道來的時候，這篇講話一定非常動人。我感到它也許超出了詩人的水平，簡直就是石頭語言的原文。讀著它，我仿佛看見一個巴勒斯坦的孩子，是達烏德或者達爾維什，他挺身站在黑煙滾滾的瓦礫上，迎著怪獸一般碾壓而來的坦克。他迎著火光，全力投出了石塊。野獸噴出火焰，他倒在燃燒的瓦礫裡。從火中飛出了一隻鴿子，銜著一塊沾血的石塊。

受難的石頭的語言，淹沒在瘋狂的轟炸聲和大規模殺傷性宣傳媒體的咕噪中，微弱而無力。但畢竟這是神性的語言；它喚起的良知，它種下的希望，會在下一個時代從廢墟中發芽生長。畢竟，從未成年的孩子到90歲的老人，我們也

③ 〈大侵入的前夜〉，《世界》2002年6月號，第52頁。

同時目擊了最高尚的形象。

這是一個投石時代。薩拉馬戈也好，衫原幸子也好，E·賽義德也好，那些沖進伯利恆聖誕教堂為難民送去幾瓶水的救援者也好，那個踏上被夷為瓦礫的傑寧忍不住失聲嚎哭的女人也好——他們都和投石的少年一樣，只是在使用最後的語言。

在冷漠的沉默中，我傾聽著，心裡充滿恐怖的感覺。我不願聰明地避開更不願表演公允，我不能加入看殺的一翼。我清晰地聽見了那聲音，我要把它們翻譯成漢語。我想竭盡微力回答對我的呼叫。我想讓自己的文章也變成石塊，擲向這無義的世界，並拯救自己的良心。

這是一個投石的時代，思想、文學、言論都被霸權恐怖主義的火力壓制得抬不起頭，悄無聲息。我們也一樣，我們的文學和訴說也應該緘默，讓位給卑污的喧囂和霸權話語的複製。一切有意味的語言都被迫變形了，就像戰鬥只能投石。今天是戰士給人以啟發的時代，因為他們的戰鬥並不為取勝；他們只為在火獄的烈焰中，用一己的生命，向人類發出最後的一聲呼喊。

如果一場對決的目的並非為了取勝，如果一方的手段變成了徹底的藝術；那麼沉睡的良知就可能醒來。這樣的啟發驚心動魄，有了它，聾聵的視聽可能被療救。真正的語言最終是不會泯滅的，它超出了種族和宗教，訴說著人對公正和大同的夢想。會有一天，人們會為這投石的語言感動，他們會奮起譴責霸道，並悼念那些——留下了石頭的遺言一去不返的死者。

等到毒火如洪水退去的時候，鴿子會再一次銜著橄欖枝飛來，像古老的聖經故事一樣。烈火中涅槃的鳳凰會在和平中再生，以摧人肺腑的聲音，喚醒死去了的希望。